

“ 贵州文化 ” 界说

1995年的金秋时节 在风景如画的花溪 召开了一次贵州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第一次把“ 贵州文化 ” 作为一个学术问题 提到全国乃至世界的范围内来作探讨，这在贵州史上是破天荒的。有人提出质疑 认为贵州并没有形成一种单独的文化 只不过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局部而已。这种质疑是有道理的 因为 贵州的种种文化现象 都是在中华大地上孕育、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任何时候都没有脱离这个母体。然而 从文化的地域差异来看，“ 贵州文化 ” 这个概念 显然是可以成立的。它和中原文化、齐鲁文化、三秦文化、塞北文化、东北文化、关陇文化、西域文化、青藏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滇文化一样 都是一种区域性的文化。这些区域文化 是在某一特定的空间范围内逐渐形成的 由于历史、地理和民族的不同 天长日久 产生若干差异 显示出彼此不同的文化风貌 亦即地方特色。

“ 贵州文化 ” 有什么特色呢？这是一个很不容易把握的问题。它既不像中原文化那样具有典型的汉文化特征，也不像青藏文化那样有着浓郁的藏文化特色 既没有塞北文化的粗犷与奔放 又没

有江南文化的灵秀与婉约。与邻近地区的文化相比，也有点“似是而非”近川者似川 近楚者似楚 近粤者似粤 近滇者似滇 但又非川、非楚、非粤、非滇 有些不可名状。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用任何一种地域文化的尺子来衡量它，都不尽合适，这恰好就是它成为一个文化单元的重要依据。把它纳入汉文化的体系吧，又有大量少数民族文化存在。说它是少数民族文化吧，事实上汉文化又成了主流。拿汉文化来说，也不是纯粹的中原文化，仿佛是经过多次过滤才传入的，使人有“五方杂处”之感。拿少数民族文化来说，也并非同属一个体系，苗瑶的、氐羌的、百越的、濮僚的都有，而且演化极其纷繁。

特点总是在相互比较中才能显现出来。犹如红、黄、蓝、绿的单一色调是一种特色，由多种颜色组合而成的“花”也不能不说是一种特色。也许“杂”就是贵州文化的最大特点。这种“杂”不单是指它的来源极其广泛，更重要的是，各种文化固有的特质依然保存。彼此间的渗透、交融是有的，但“同化”中有“异化”，“异化”中有“同化”，尽管共性逐渐增多，而个性仍很鲜明。或许可以这样说，贵州文化是中国“多元文化”的一个缩影，一种特殊类型，它与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多元”不同，并未完全交融而为一体，而是“多元共生”。因此，贵州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它包括若干民族文化的子系统和区域文化的子系统，乃至分子系统。

贵州文化的形成，一方面导源于各种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另一方面又深受特定的地理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也就是说，人与地密切结合，产生了一种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文化风貌——山野与古朴。严格说来，贵州是个重要的移民区，不但汉族是由外地迁入的，少数民族也大都是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陆续从四面八方迁到贵州来的。这里是古代南方四大族系交汇的结合部，同时又是汉族

移入量超过少数民族的地方。众多的移民，带着各自不同的文化习俗进入贵州 经过长时期的接触、碰撞、交流、吸收 构成了一部和諧、有序而又独特的交响乐。然而，当他们踏入贵州高原以后，所面临的生存空间，都是峰峦叠嶂的大山。山是贵州最鲜明的地理特征，是各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特定环境，也是他们进行文化活动的共同舞台 这就使多元的贵州文化打上了“山地文化”的印记。如果说，由多元组成的民族文化是贵州文化的灵魂的话，那么，山地文化则成为它特有的风骨。

在历史长河中，贵州文化的走向，一方面深受全国形势演变的控制 另一方面又因其“不内不边”的特殊身份 其发展往往不能完全与全国同步。把贵州文化的演进，放在中国与世界的大背景下来作考察，在历史的屏幕上，即刻显示出一条起伏不定的波形曲线，并清晰地看到几个重要的临界点。在人类起源及漫长的“史前”时期，贵州文化因其灿烂而令人瞩目。可是在一段辉煌过去之后，骤然跌落下来，与商周及春秋战国的繁荣境况根本无法相比。从秦汉开始与中原文化接轨，可是，这一过程延迟了一千多年，直到明清才“渐比中州”。戊戌变法时期贵州崭露了头角，但“西学东渐”在军阀混战中突然受阻，与西方文化的接轨到抗日战争时才出现了一个短暂的高潮。“三线建设”带来了现代的高新技术，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在新世纪到来之时又有许多困惑。

纵向的比较，使人感到欣慰，贵州文化逐步与全国、与世界接轨 然而 无论是哪一阶段 它的发展都极不充分 都存在一个较大的差距 显得“先天不足”所以 就总体水平来讲 它在全国处于滞后状态，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使人感到震惊的是，在贵州这个偏远、落后的山乡，思想文化却不时闪现耀眼的

光芒 不但跟上了时代的步伐 而且有时还一度超前。在程朱理学笼罩全国的年代 思想界死气沉沉 是王阳明的心学打破了这种沉寂 激起了轩然大波 而这种新的思想 不是产生于繁华的京城 也不是发端于阳明的故乡，而是在僻静的贵州龙场。特别是到了近代，思想更加活跃。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贵州发生了长达 20 余年的咸同各族人民大起义 爆发了十几次“反洋教”斗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护国护法 贵州都处于领先地位。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许多重要人物都出在贵州，反映出思想界的斗争相当激烈。抗日战争中，“战时文化”的高涨 也有过一段辉煌。

站在世纪之交 回眸历史 观照现实 对“贵州文化”不能不引起许多思考。落后的贵州 产生出先进的思想 似乎有些不合乎逻辑 有些不可理解。其实 答案就在贵州文化的形成中 因为它是一种多元文化 因为它是由诸多移民带来的文化 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不定一尊 不拘一格 思想易于解放 容易接受新鲜事物 这是贵州文化最大的优点。历史告诉我们 当历史的浪潮波及到贵州时 贵州文化便呈现一阵兴旺 而潮汐退去之后 又衰落下来 这与贵州特定的区位有关 因为它远离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只有当中央把视线关注到西南时 贵州才显得重要 汉代、南宋是如此 明代及南明是如此 抗日战争和三线建设也是如此。“机不可失 时不再来”值此西部大开发之际 贵州如何抓住这个新的机遇呢？要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开放的意识、科学的态度 冷静地思考 贵州问题”。

机遇是存在的 但西部大开发给我们提供的 只是一种发展的可能性 而且并不是专对贵州。对西部任何一个省区来说 这种机会都是平等的，谁能把握时机而又能充分发挥所长，谁就是胜利者。站在大潮面前 左顾右盼 东张西望 举棋不定 必然会坐失良

机。毛泽东同志说得好：“指挥员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密的调查研究。”对贵州省情的深化认识，对贵州历史的深刻反思，是制定贵州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础，“可持续发展”要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未来，放眼于世界，努力寻求一条未来发展与进步的道路，而不是鼠目寸光，只注重眼前的利益。这里需要的是理智，是深谋远虑的理智，是十分冷静的思索。

面对贵州历史与现实的实际，有必要重新审视贵州省情，理清战略决策的思路。应当牢固树立“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指导思想，站在时代的高度，用“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观点，重新阐释这两句话，认真考虑贵州的前途。人口增长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已成为当今世界上的两个爆炸性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在贵州都显得极其尖锐，因此，在强调人口控制的同时，要响亮地提出“十年树木”保护和优化贵州的生态环境。陈履安的《两难困惑中的抉择——贵州矿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是很有思想的，他主张“摒弃传统的发展模式”，这是值得注意的。从根本上讲，贵州的发展，还必须在“百年树人”上狠下功夫，其中许多历史借鉴，何静梧等人在《贵州社会文明的先导——贵州历代著名教师》已经讲了。我在这里是想从大文化的角度来作一些探索，在历史寻踪的过程中，寻觅贵州文化发展的途径，希望对贵州的未来，能够有所裨益。

民族文化的聚焦

当我们把历史的镜头对准贵州文化的时候，首先便聚焦在民族文化上，这是无论如何不容忽视、不可取代的显著特点，不充分认识这种特质，就不可能真正了解贵州文化。贵州古代绝不是什么“洪荒之地”从距今 20 多万年开始 这里就有了辉煌的“史前文化”因此 贵州文化已不是“上下五千年”而是从古到今 20 多万年。中华文化是由多种民族文化汇聚而成，在先秦时期，华夏文化在中原崛起，而在此时，夜郎独步西南，它所创造的文化是西南民族文化的代表，可惜这失落的文明至今还没有寻找回来，没有人能够把它解说清楚。同中华文化一样 贵州文化也是“多元”的 这种“多元文化”的形成 很大程度上与人口的流动有关 或者说是由移民带来的多元文化，这是观察贵州文化的一个重要视角。然而不同的民族进入贵州，尽管文化传统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共处在一个大致相同的文化生境，受着山地环境的制约，这又形成了贵州文化的共性 各种文化都打上“山地文化”的烙印 而且相当深刻。在大山之中 各种民族文化“共生共荣”不同时代的文化现象积淀下来，这就使贵州成为一个天然的民族文化博物馆，有其丰厚的文化

底蕴和内涵,它的特点是“既多且奇”无与伦比。下面我们将镜头拉开,依次展开论述,逐一解读贵州民族文化。

石器时代的辉煌

蜀汉建兴三年(公元 225 年)诸葛亮南征 临行之际 给后主上了一道《出师表》其中有“五月渡泸 深入不毛”之句。因为这是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流传很广,于是在人们的心目中,云贵高原便被视为“不毛之地”。其实 这纯粹是一种误解 尽管当时的云贵远不如巴蜀富饶,但它却有辉煌过去,这里是人类起源的地方,在“石器时代”曾经大放光彩。不过 进入农业社会以后 渐渐衰落下来。古老的文明失落了,直到现代,人们才从考古的发掘中,重新找回那失落的文明。



谁也没有料到,在远离中国文化中心的云南和贵州,在莽苍深处 在“猿猱欲度愁攀缘”的崇山峻岭 曾经是远古人类栖息、繁衍的地方,是人类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关于人类的起源,尽管人类学家们还持有不同意见,但大多数都公认猿和人有共同的远祖,谁也无法拒绝承认人是由猿演化而来的事实。体质人类学的研究表明,直立行走和智力发展是由猿进化为人的两个重要关节点,从而把人类发展的过程分为古猿、直立人和智人三个阶段。古猿是从猿到人的过渡阶段,或者说是正在形成中的人,他们生存在距今 3000 万年至 400 万年。真正演变成人是从直立行走开始的,按照其体质特征和进化程度,分为早期直立人和晚期直立人,前者生存在距今 400 万年至 150 万年 后者生存在距今 150 万年至 20 万年。

尽管体质上还带有某些原始特征 但脑量接近了现代人 这便进入了“智人”阶段 亦分早、晚两期 早期智人生活在距今 20 万年至 5 万年 晚期智人生活在距今 5 万年至 1 万年。令人感到欣喜的是，这些听起来有如“天方夜谭”的人类进化史 在云贵高原都留下许多古老的遗物 能够较清楚地看到从“古猿”到“直立人”从“直立人”到“智人”从“智人”到现代人的发展脉络。

大约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美国人类学家奥斯朋便提出一种假说 认为人类应起源于亚洲的高原。他的假说并没有错 至少估计到亚洲是人类起源的重要区域，估计到云贵高原有这种可能性。1932 年，路易斯在印度、巴基斯坦北部边界的西瓦立克山发现了一具带有 3 颗牙齿的上颌骨化石 命名为“腊玛古猿”(现统一称为“西瓦古猿”) 他把这种古猿定为人科，可是被人武断地否定了，但 20 年后终于得到公认。1937 年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贾兰波 为了寻找“北京人”的来源 探寻古人类的迁徙路线 第一次到云南作考察，从此开始了有世界意义的学术活动，寻找失落的古老文明。

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证明，云贵高原可能是人类的摇篮。在这个“苍山如海”的高原上 终于发现了从猿到人过渡阶段的“开远森林古猿”和“禄丰古猿”它们是“西瓦古猿”的一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直立人也在云南找到了 它就是“元谋人”据科学家们测定 它属于早期直立人阶段 比“北京人”更为原始 其绝对年代距今 170 万年。晚期直立人目前在云南尚未找到 可是在贵州却发现了“桐梓人”。贵州发现了早期智人的化石 分别命名为“水城人”和“大洞人”。在云南发现的“昭通人”、“西畴人”、“丽江人”、“昆明人”大抵都属晚期智人 与贵州的“兴义人”、“穿洞人”、“马鞍山人”、“桃花洞人”、“白岩脚洞人”、“安龙观音洞人”、“安龙福洞人”、“长顺青龙洞人”是同一时代的。人类形成、演进的历程在云

贵高原显得十分清楚，其间并无缺环。这使我们想起了贾兰波先生的《中国大陆上远古居民》一书，他在书中写道：“我国西南广大地区，根据已有的线索，位于人类起源的范围之内。”正如北京大学苏秉琦教授论断的一样：“有人提出中国（特别是中国的西南地区）是人类起源的摇篮之一，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贵州处于云贵高原东部，这里是古人类活动频繁的地区，因而，古人类遗址的密集程度在国内是罕见的。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六盘水一市就发现了六枝“桃花洞人”、“水城硝灰洞的”“水城人”和盘县“大洞人”。在普定的穿洞出土了两具人类头骨化石，除“穿洞人”而外，普定还有“白岩脚洞人”。桐梓人是在桐梓县城附近的岩灰洞发现的，在这个县的东南隅又发现了“马鞍山人”。偏在黔西南的安龙县有“安龙观音洞人”和“安龙福洞人”。在兴义猫猫洞发现了“兴义人”。在长顺威远镇发现了“青龙洞人”。如此等等。

云贵高原成为人类起源的摇篮决非偶然，这与它的地理环境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重大影响的，特别是在人类的婴儿时期，这种影响更加明显。云贵高原有许多条件适宜古人类的生存、发展，若干条件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它位于北纬 $24^{\circ}37'$ ~ $29^{\circ}13'$ 之间，海拔为 500 米至 2900 米，这种“低纬度、高海拔”的特点，使大部分地区处在温湿季风区和亚热带气候区，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最适宜人类生存。这对于那些依赖自然较大的古人类来说，可谓得天独厚。云贵高原又是典型的“山国”，地形复杂多样，有高原、山原、高山、中山、低山和丘陵，还有星罗棋布的山间盆地和河谷平地，适宜多种动植物生长，而且往往呈垂直分布，堪称“植物王国”和“动物王国”。这对于以采集、狩猎、捕鱼和原始农耕为生的古人类，无疑提供了一个优越的谋生环境。再说，在云贵高原上，喀斯特地貌强烈发育，特别是贵州部分，有许

多天然的洞穴，这是古人类栖息的理想处所。在这里，石灰岩出露面积很广，石料随处可见，这又为发展石制工具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凡此种种，人类起源于云贵高原并获得发展，完全是情理中的事情。

有了人，便开始有了人类的历史。尽管说，这是一个渺渺茫茫的时代，但它毕竟是人类历史长河中必不可少的一段，而且是人类历史文化的源头。按照习惯的说法，在文字产生以前的历史，即所谓“史前史”而在这一漫长时期的种种文化现象，也就是所谓“史前文化”。贵州的“史前文化”至少可以从距今 24 万年说起。如果今后有新的发现，还可能提得更早。由此看来，说贵州文化“源远流长”绝对不是随便说说的套话，而是有根有据的历史事实。有大量“史前文化”遗迹可以佐证。只说“源远流长”似觉言犹未尽，因为这仅仅反映了它时间久远的一面，不能反映它丰富的文化内涵。贵州的“史前文化”曾经放射奇光异彩，在全国占有重要一席。

二

“史前文化”即原始文化。从广义上讲，它包括原始社会的各方面，从人自身的进化讲起，涉及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生产工具是“衡量人类控制自然的尺度”。世界各国的考古资料证明，从距今 300 多万年出现早期直立人开始，一直绵延到公元前 3500 年左右，人类都使用石制工具进行生产。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几乎毫无例外地制造和使用石器。这就是说，在青铜时代到来之前，经历了长达 300 多万年的“石器时代”。石器贯穿整个原始社会，成为史前时期的主旋律。就整个石器时代而言，大体分为两个大的段落，即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新与旧是相对的，大致说来，旧石器以打制石器为主，多半使用直接打击法，工具类型分

化不甚显著，后期出现了骨器和角器；而新石器以磨制石器为其特征，工具种类增多而且分工明显，加工方法多样而且制作趋于细致，并出现了具有标志性的陶器。古人类在贵州这块土地上留下许多遗迹，已知的古文化遗址多达数十处，已发掘的有 10 多处，包括旧石器早期、中期、晚期的遗址及新石器时代遗址，而且其中有些具有典型意义。

在本世纪 60 年代以前，人们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地搜索历史文献，翻阅了浩繁的史书，好不容易找到几条关于牂牁、夜郎的史料，但仔细算来，不过是两三千年的历史。自 1964 年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试掘了黔西观音洞文化遗址，发现了大批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遗物，贵州的历史线索突然向前延伸到了 20 多万年，大致与“北京人”同一时代。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它打破了许多陈旧的观念，推翻了贵州自古是“不毛之地”的谬说，校正了被埋没和被歪曲的历史，揭开了贵州“史前文化”的帷幕，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极其遥远的太古。

有人把“观音洞文化”称为贵州旧石器考古在全国名列前茅的“第一乐章”，我看是毫不过分的。这不仅是因为它发掘的时间在贵州最早，而且的确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结果一经公布，便在全国轰动，把人们的视线一下子引向从来不被人重视的贵州。裴文中先生首先肯定它是“我国最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之一”，并认为这种文化独具风貌。如果说，在旧石器时代的早期，北方有西侯度文化、蓝田文化和北京周口店文化的话，那么，在南方则有黔西观音洞文化。这决不是“夜郎自大”，也不是人为的某种“轰动效应”，而是科学验证了的事实。以白寿彝为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在第二卷中写了这样几句很有分量的话，它说：“在我国南方，属于更新世中期的遗址首推贵州黔西观音洞。”在与全国同

期文化遗址进行了比较之后,又特别指出“黔西观音洞石器加工之细致和方法之多样,为同期各地石器之冠。”正是这个原因,黔西观音洞与山西西侯度、北京周口店鼎足而三,成为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有代表性的三种文化类型。

在199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名列榜首的就是“盘县大洞旧石器时代遗址”。这又是贵州的一个重大发现,是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典型遗址。属于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址,全国为数不多,南方更是寥若晨星,而贵州却发现了三处:一处是桐梓岩灰洞,一处是水城硝灰洞,另一处就是盘县大洞。就其规模而言,盘县大洞无论在国内或国外都是极其罕见的,总面积超过8000平方米。虽然它的发掘还在进行之中,但出土物显示的文化内涵已使人感到万分惊喜。既有人类化石,又有大量动物化石和石制品,还有人工取火的遗迹。说它是一个巨大的“宰杀动物的场所”并不过分,已出土的动物化石近万件,经过鉴定,有哺乳动物6目40科,大抵属于南方“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另有少量鸟类和鱼类化石。说它是“石制品加工场所”也是很恰当的。在已清理的92平方米的工作面上,获得了近2000件石制品,还有许多石料、石核、石片。尽管它在“石器工业”技术上仍保持“观音洞文化”的传统风格,但又有新的突破,出现了一种类似欧洲“勒瓦类哇”型的手斧和一种类似缅甸“安雅特文化”常见的手镐。这里有面积较大、较厚的灰土层,有烧裂的岩石,还有大量燧石。科学家们推断,这是人工用火的痕迹,很可能是用打击燧石的方法取火的。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分布广、类型多、内涵丰富。这一时期的主要遗址有兴义猫猫洞、普定穿洞、桐梓马鞍山、六枝桃花洞、普定白岩脚洞、安龙观音洞、安龙福洞、长顺青龙洞、威宁草海等。文化类型多样化是此期的一大特点,大体说来有四大类型:兴义猫猫

洞以锐棱砸击法为主 桐梓马鞍山以锤击法为主 普定穿洞的早期以锤击为主而晚期以锐棱砸击法为主，威宁草海可能是另一种类型。这一时期的石器 样式多、型制稳定、加工细致 出现了大量骨器和角器 火的使用愈加普遍。安龙观音洞可能是一支新秀 这个遗址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研究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逐步演进的典型遗址 填补了贵州新石器早期文化的空白 对于地层学、年代学、埋藏学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

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整个文化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人类的智力已有较大发展，体质上的原始特征完全消退 进入了“现代人”的阶段。人们的婚姻越出了血缘集团 向外开放 并导致了氏族的生产 从而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进入了“氏族社会”包括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农业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人类的经济由“掠夺自然”转变为“生产物品”从此有了农耕和养殖 刀与火结合而产生“刀耕火种”农业 人们渐渐定居下来而成聚落。陶器是这一时期的重大发明 它是火与土结合的结果 为金属的冶炼、铸造开辟了道路。农业、手工业的发展 引起了一次大的冲动 掀起了工具改良的热潮 于是 石制工具向着精细化、专业化方向发展，磨光的石器渐渐取代粗笨的旧石器。

贵州新石器时代的遗物散见全省各地 主要有石斧、石锛、石刀、石锤、石凿、石杵、石臼、石箭镞、石网坠、石纺轮、石范等。重要的遗址不多 只有平坝飞虎山、普安铜鼓山和毕节青场三处 以普安铜鼓山最具代表性。在这里发现了立柱式房屋遗址、灶和窑 出土了 150 余件新石器和一些骨器、角器、蚌器 还有器型多样、纹饰丰富的陶器。有了刀、斧和锛，人们才可能砍伐森林，开垦耕地。有了箭镞 便可在远距离杀伤野兽。有了鱼网 捕鱼更有成效。有了石纺轮 人们开始了纺织。房屋、灶、石杵、石臼以及陶器的出

现，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定居。重要的是在这些遗址中，有了窑，有了石范、陶范，有了坩埚，这就意味着人类即将迈步进入“铜石并用时代”，迎接人类文明的新曙光。

三

贵州的旧石器之所以令人瞩目，除了有许多在全国占重要地位的典型遗址而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闪光点，那就是“锐棱砸击法”。旧石器时代的标志物是“打制石器”，也就是说，制作石器的基本手段是“打击”，即应用力的冲击作用，先将石料打成毛坯，然后仍以打击方法进行二次加工。根据考古学家们的研究，打制技术的发展经过几个阶梯。最为原始的是碰砧法和投击法，事实上是以石相击而使石料破裂，意向性不很明确，打击的结果也很难预料。往后进了一步，将石料放在地上，然后握着一块坚硬的石锤有目的地朝着某一方向打击，这便是所谓“锤击法”。再进一步，把要加工的石料放在一块石砧上，一手扶着，另一手紧握石锤猛击，使之两面受力，这就是“砸击法”，或者叫做“两极打击法”。往后又出现间接打击法，即将木棒或骨料放在被打击的石料上，通过它们把力传到石料上而使石片剥落，以期收到较好的效果。然而，在贵州出土的旧石器，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用常规的方法打制成的，它是一种既不同于碰砧与锤击，又有别于寻常的砸击方法，考古学家们把它叫做“锐棱砸击法”。用这种方法打成的石片称为“锐棱砸击石片”，剩余的石核称为“锐棱砸击石核”，以它们加工成的石器叫做“锐棱砸击石器”。

这也许是贵州古人类的一大发明，是原始技术的一种创新，从全国范围来看，具有鲜明的独特性。这是人类智力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由于人类进化到智人阶段，头脑渐渐聪明起来，于是加工

的预期性增强,有意识地制造某种需要的工具,因而有可能在锤击法和砸击法的基础上有所发明,有所创造。这种打击方法大概是这样的:先在地面上置一石砧,然后以左手握住放在石砧上的石料,右手执石锤的侧缘,连续猛击石料。这在今天看来,当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技术,但在几万年、十几万年前,可堪称是“天才的创造”。因为那时人类还相当幼稚,每一点微小的改进,都要经过若干万年的尝试,经过无数次的失败与成功,毫无疑问,锐棱砸击法不仅抛弃了原始的碰砧法与投击法,而且综合了锤击法与砸击法的优点,作了新的改进。

当然,使用锐棱砸击法打制石器的并不局限于贵州,在西藏、四川、广西、广东、台湾以及菲律宾都使用这种打制方法。但是,迄今为止,那些地区的锐棱砸击石器,都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而贵州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就已经有了。从时间上看,首先开创这种新技术的是“水城人”。其他地区的锐棱砸击法都比它要晚许多世代。从发展程度来看,其他地区使用的频率、发展的规模都远不如贵州。这就是说,锐棱砸击法在贵州最为发达,发展最为充分。华南及东南亚使用的锐棱砸击法,是否都是由贵州传播去的,目前还找不到确切的证据,但以贵州最早、最集中、最发达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贵州旧石器制造的一个显著特点。锐棱砸击法的首创者是“水城人”。在水城硝灰洞中,发掘了53件石器,其中有砸击石锤和锐棱砸击石锤各一件,锤击石片5件,锐棱砸击石片28件。从这个材料中可以看出,“水城人”在继承“观音洞文化”锤击法的基础上有了创新,锐棱砸击法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占了上风,锐棱砸击石片要占全部石制品的53%。

这种新式技术,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兴义人”和“穿洞人”那里,又进一步发扬光大。在兴义猫猫洞遗址中,共获得石制品

4000 余件 从中选出 1211 件标本 经过仔细研究 分为石锤、石片、石核、石器等几类。在石锤中 锐棱砸击石锤占 50% 锤击石锤占 40% 而砸击石锤仅占 8.9% 在 315 件石片中，锐棱砸击石片有 245 件 占总数的 78%。石核共 129 件 其中 锐棱砸击石核为 103 件 占总数的 79.8%。80% 以上的石器都是用石片制成的，而用锐棱砸击石片进行加工的要占 79.5%。对石锤、石片、石核和石器分析的结果表明 锐棱砸击法在这里已成为主要的加工手段 锤击法降居次要地位，砸击法很少使用，碰砧法更是可以忽略不计了。在国内 像这样广泛使用锐棱砸击法的遗址 到目前为止 应当说是独一无二的。

又拿普定穿洞来说，在早期的文化层中，打片方法以锤击为主 偶尔使用砸击法 可是 到了晚期 锐棱砸击法上升到主要地位 锤击法已大为逊色 而通常的砸击法简直成了凤毛麟角。这里使用的石器打制工具，主要是锐棱砸击石锤，很少使用锤击石锤。早期的石片 有锤击石片、砸击石片、锐棱砸击石片和使用石片四种 但从第五层以上则多是锐棱砸击石片。石核也是如此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往后锐棱砸击石核所占的比重越大。刮削器、尖状器、刃状器等多用锐棱砸击石片制成 砍砸器之类则多用锐棱砸击石核做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幅技术演进的图景：“穿洞人”原先使用的是锤击法和砸击法 以后渐渐采用锐棱砸击法 并以它来取代古老的锤击法，同时将传统的砸击法加以淘汰。

这种现象并不是孤立的 除了兴义猫猫洞和普定穿洞而外 其他旧石器晚期遗址中也可以寻其线索，只不过所占的比例不同罢了。譬如桐梓马鞍山遗址 石锤有 3 种 锤击石锤较多 砸击石锤极少 而锐棱砸击石锤又有自己的特点 称为“马鞍山型”。六枝桃花洞 有一种石锤与水城硝灰洞出土的锐棱砸击石锤相似 而刮削

器多用锐棱砸击石片做成。安龙观音洞出土的石器、石核和石片，也大体与兴义猫猫洞的出土物相似。以上事实说明，自旧石器时代中期开始 打制石器的方法渐起变化 新发展起来的锐棱砸击法逐渐成为石器制造的重要方法，形成了贵州旧石器的区域性特征。

四

旧石器时代晚期技术上的一大进步，就是骨器和角器的出现。之所以把它当作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主要还不是因为制造工具的材料在石料之外又增加了骨和角，而是因为骨器和角器的制作在技术上有更高的要求。人所共知，骨和角质地坚硬而富有韧性 要将它们肢解并做成器物 比之打制石器要困难得多 需要经过切割、打磨、钻孔、雕琢等工序 这就牵涉一系列技术问题 包括工具和技能 所以 骨角器的制造 在那样的时代 可以说是一种“尖端技术”。还应该看到 骨角器的出现 使工具变得轻巧 它的打磨技术便成了磨制石器的先导，从而成为推动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的一种因素。

在我国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骨角器并不是很多的 据说 除贵州而外 其他地区出土的骨角器相加起来不过两百件左右 主要出土地点 有辽宁海城小孤山、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四川资阳黄鳊溪、宁夏灵武水洞沟。然而 在贵州 出土骨角器的地点 有普定穿洞、兴义猫猫洞及桐梓马鞍山、六枝桃花洞、安龙观音洞 仅此一点 就使人感到惊讶 因为贵州一地就超过了其他地区的总和。更使人震惊的是，仅在普定穿洞就出土了近千件骨器和角器 这不仅在中国 就是在世界上也是一大奇迹。贵州的骨角器 在国内外处于领先地位 它不仅是“独领风骚数百年”恐怕应当是数千年、数万年了。